



人文学术
RENWEN XUESHU



儒家伦理与徽商精神

梁德阔◎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儒家伦理与徽商精神

梁德阔◎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家伦理与徽商精神/梁德阔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309-10894-1

I. 儒… II. 梁… III. 儒家-伦理学-关系-商业史-徽州地区-明清时代
IV. ①B82-053②F7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0117 号

儒家伦理与徽商精神

梁德阔 著

责任编辑/宋启立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93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894-1/B · 510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1	绪 论
40	第一章 徽商的儒学传统
40	第一节 徽商的儒学渊源
60	第二节 徽州的儒学传承
76	第三节 朱熹与徽州
95	第二章 徽商“贾而好儒”
95	第一节 徽商的儒贾表现
110	第二节 徽商的重教传统
130	第三节 徽商的儒贾观
153	第三章 家国观念
154	第一节 敬宗收族
175	第二节 忠君报国
195	第三节 崇尚文化
216	第四章 个性品格
216	第一节 吃苦耐劳
237	第二节 开拓进取
260	第三节 勤劳节俭

284 第五章 商业伦理

284 第一节 乐善好施

303 第二节 诚实守信

320 第三节 团结协作

339 余 论 对“韦伯式问题”的批评与反思

354 参考文献

373 后 记

绪 论

一、研究旨趣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徽州情缘。走进徽州，一处处“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①的古村落便展现在眼前，存留其上的大量古民居、祠堂、牌坊、雕刻等，仿佛在述说着历史的风云变幻。宋元以来，徽州地区科第蝉联、累世簪缨、人文荟萃，被誉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宗法制度的完备和宗法观念的强固是徽州地区一个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在徽州，“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②。这种以尊祖、敬宗、睦族为特征的宗法制度，形成了徽州“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③以及族人之间“相亲相爱，尚如一家”^④的社会风尚。难怪近代著名学者胡适在口述自传时，第一句话就自豪地说：“我是安徽徽州人。”^⑤他在一首诗《希望》中写道：“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这是羁客天涯的游子袒露他对故土的眷念，倾诉一种如

① 程且硕：《春帆纪程》。

②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故老杂记》。

③ 嘉靖《徽州府志·风俗》。

④ 同治《黟县三志》卷15，《文艺志》。

⑤ 胡适口述：《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鲠在喉的乡愁。

徽州,这个古老的地域名称,一向名闻遐迩。这不仅因为她拥有黄山之奇、齐云山之秀、新安江之美,还因为这里曾经孕育出颇具特色的“新安文明”或说“徽州文化”^①。徽州文化既是地域文化,又是儒家文化传承的典型,它继承了以孔子、朱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进而发展成了新安理学,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说它是地域文化,是因为它具有宗族文化和儒商文化的地域特色;说它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因为明清时期中华传统文化中心已从中原地区移往东南一带,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徽州^②。徽州文化博大精深、体系完整、特点鲜明,主要包括徽州商帮、新安理学、徽派建筑、徽州朴学、新安教育、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州刻书等等。徽州文化自南宋崛起,至明清已发展到顶峰,现在正“以其整体性、独立性和重要历史学术价值,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地方学——徽学,被誉为与藏学、敦煌学相并列的中国三大地方显学之一”^③。

笔者的徽州情缘可以追溯到2003年,这年我到安徽大学任教,随即我与另一位同事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中心的重大项目“徽州村落的研究与开发”,直至2009年课题结项。期间,我又主持了安徽大学青年创新基金项目“徽商企业制度研究”。五年来,我查阅了大量的徽学文献,多次到徽州进行田野调查。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的学术兴趣越来越聚焦在徽商方面,这主要受以下三方面的启发。

首先,为什么徽商能够获得巨额财富。早在明代,谢肇淛就指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他还补充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④这是他比较各大商帮之后得出的结论。顾炎武也说:“新都

① 张海鹏:《求实集·徽商与徽州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② 叶显恩:《徽州文化的定位及其发展大势》,《徽州社会学》2004年第14期。

③ 陈强:《徽州文化的历史定位与研究现状》,《安徽日报》1999年2月11日。

④ 谢肇淛:《五杂俎》卷4。

(徽州)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①明嘉靖后期,“屈指天下富室居首等者,凡十七家,徽州即有两家”^②。万历年间徽商的财富更是惊人,徽州人承认:“邑中之以盐策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有黄氏,后则有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百万以汰十万者。”^③这时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已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股东勒迈尔的8100英镑的资产了^④。至清代,盐商多“富以千万计”^⑤,至于“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彼纲总者,得嘻笑而呼叱之”^⑥。就其经营规模和资本额而言,已达到了传统商业的巅峰。乾隆皇帝南巡扬州时不由地惊叹:“富哉商也,朕不及也!”^⑦而侨居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更是乐不思蜀了,“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归乡”^⑧。那么,徽商如何能获取如此之多的财富呢?笔者认为,这除了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有关外,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徽商精神。古今中外的商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文化的较量和精神的博弈。

哪些精神使徽商在商业竞争中胜出一筹呢?徽商的敬宗收族、忠君报国、乐善好施、诚实守信、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等精神,是他们在商场竞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徽州“堪称正统宗族制度传承的典型”^⑨,民国《歙县志》记载:“邑俗旧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数姓,姓各有祠,支分派别,复为支祠。”^⑩这种以尊祖、敬宗、睦族为特征的宗法制度在徽州非常完善,可以使徽商获取宗族内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徽州宗族将皇帝的“圣谕”视为金科玉律,有

① 顾炎武:《肇域志·江南十一·徽州府》。

②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36,《严氏富货》。

③ 万历《歙县志》卷10。

④ 叶显恩:《古代商人·序》,参见王明裕编:《古代商人》,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1页。

⑤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5。

⑥ 《清朝野史大观》卷11,《清代述异》。

⑦ 汤殿三:《国朝遗事纪闻》第1册,《高宗南巡遗闻五则》。

⑧ 惺庵居士:《望江南百调》。

⑨ 叶显恩:《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较研究》,参见《'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⑩ 民国《歙县志》卷1,《舆地志·风土》。

的宗族祭祖时还在祠堂“特加宣诵，各宜体行，共成美俗”^①。他们把皇帝的“圣谕”作为制定族规家法的纲领，把族规家法视为“圣谕的注脚”^②。这是徽商获得盐业垄断贸易的前提条件。徽商对家乡总是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致富后，首先是在家乡兴办公益事业，为家乡尽力。这种“惠及乡间”的质行义举，尽管耗费了不少资本，但为他们赢来了一片颂声，为其商业发展夯实了基础。《士商类要》说，“贸易之道，勤俭为先”，这是徽商闯荡商海多年的经验总结。徽商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他们相信“惟以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③。与诚信相联系的是“义利”问题，徽商的信条是“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④，恪守“以义取利”、“利缘义取”的贾道原则，强调货真价实，结果往往是“不言利而利自饶”。徽商有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的精神，“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⑤。胡适把徽商这种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敬业精神称之为“徽骆驼”精神，绩溪人则称为“绩溪牛”精神。诸如此类徽商精神还有很多，不便枚举。

人们不禁要问：徽商精神的基本特色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特色？“贾而好儒”是徽商的基本特色，他们的精神凭借是儒家伦理。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⑥，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从而形成了“贾而好儒”的重要特色。徽商认为“非儒术无以亢吾宗”^⑦，“非诗书不能显亲”^⑧，即使富比王侯，也不能光宗耀祖。徽商的儒贾风范与他们的家世渊源有关，徽州名门望族多是“中原衣冠”，他们迁入徽州后，出于生存的需要和文化的传承，极力维护原有的宗法制度，聚族而居、尊祖敬宗、崇尚孝道、讲

① 休宁《宣仁王氏族谱·宗规》。

② 休宁《宣仁王氏族谱·宗规》。

③ 歙县《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3。

④ 歙县《汪氏统宗谱》卷3，《行状》。

⑤ 祁门《倪氏族谱》。

⑥ 戴震：《戴震集·文集》卷12，《戴节妇家传》。

⑦ 汪道昆：《太函集》卷67，《明赠承德郎南京兵部车驾司署员外郎主事汪公暨安人郑氏合葬墓碑》。

⑧ 吴吉祐：《丰南志》第5册，《从父敬仲公状》。

究门第成为徽州社会风尚。至南宋,徽州作为朱熹的桑梓之地,“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①,蔚然成风。如此,儒家伦理自然成为徽商精神的根源,上述徽商诸精神可以在儒家伦理中寻找依据。比如,徽商的忠君报国精神就是儒家“三纲五常”思想的体现。徽商乐善好施源于儒家伦理中的仁爱道德思想。“诚实守信”是儒家重要的伦理道德范畴,也是徽商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儒家强调人的吃苦耐劳、弘毅坚韧的奋斗精神,孟子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②徽商就具备这种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或“绩溪牛”精神。

其次,经济史学家格瑞夫(Avner Greif)的研究成果对我的启发。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格瑞夫对11至12世纪地中海周边两大“商贸社会”即热那亚(Genoa)和马格里布(Maghribi)的商人进行研究,他发现那些讲诚信、美德和善良的集体主义社会(如马格里布)往往静滞于一种习俗经济而难能获致一个发达的现代商业体系,而不讲诚信道德且每个人自私自利甚至不择手段地追求着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社会(如热那亚)却更容易衍生出一个法治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来^③。这样的结论似乎与徽州商人不符,徽商有着马格里布商人的文化特征,却在明清时期执商界牛耳达三百年之久,富埒王侯。徽商既重视宗族关系,又发展契约关系,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个主题,我唯恐志大才疏而贻笑大方,没敢问津。

再次,“韦伯式(Weberian)问题”引发的思考。所谓“韦伯式问题”,马敏认为有两层意思:一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等相关著作中,马克

① 休宁《茗州吴氏家典》。

② 《孟子·告子下》。

③ Greif, A.,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Lessons from Commerc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2, 1992, pp. 128-133; Greif, A., “Contract Enforceability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Early Trade: The Maghribi Coal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3, No. 3, 1993, pp. 525-548; Greif, A., “Cultural Beliefs and Organizations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2, No. 5, 1994, pp. 912-950.

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二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中,韦伯认为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阻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登泰则把第一种观点称之为“韦伯命题”:“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研究了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新教伦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被称之为‘韦伯命题’。”第二种观点他叫作“中国命题”。余英时统称为“韦伯式问题”^①。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新教的“天职”概念肯定了世俗活动,它既迫使劳动者勤奋工作,又使资本家的经济行为合法化。新教的选民预定论和恩宠观,要求每一个信徒必须终生成为僧侣,时刻坚定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的信仰,这就使新教徒的理性行为系统化,而不是个别的善行。新教的禁欲主义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资产阶级伦理观念的形成。从而韦伯解答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一种被西方人认为其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的因果关系呢?^②显然,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是西方国家历史上的特殊产物,新教伦理为之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一书中,韦伯解释了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他先把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与西方社会古代的状况做了比较,发现中国与西方社会在“物质的”条件上并无重大差别;而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

① 参见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登泰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2页;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2页;马敏:《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页。本书采纳余英时的观点,有时为了行文方便,也使用登泰的“韦伯命题”和“中国命题”的说法。

②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30, p. 1.

作为不可或缺的行动伦理。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精神上的动因,反而有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余英时想追问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未进入中国之前,传统宗教伦理对于本土自发的商业活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其具体的内容又是什么^①。具体地说,中国儒、释、道三教的伦理观念对明清的商业发展是否曾发生过推动作用。不难看出,余英时所提的问题意识正是所谓“韦伯式”的问题。依照韦伯对问题的建构方式,余英时得出的答案恰好与韦伯相反——儒家伦理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余英时认为,新教伦理中的某些观念或行为也为中国宗教伦理所具有,比如儒家伦理中同样有“入世苦行”、“理性化的过程”、勤俭、诚信、敬业等新教伦理要素。余英时指出:“韦伯所犯的并不是枝节的、事实的错误,而是有关全面判断的基本错误。”^②余英时认为,韦伯判断错误的原因是他不熟悉中国资料。韦伯所根据的儒道经典仅是《论语》、《孟子》、《老子》等少数译本,他的中国史知识也仅限于《通鉴纲目》的法译本以及早期传教士与汉学家的作品。他不但不能辨析儒、道两家有先秦与后世之异,更不知道中国思想也有上层经典著作与下层通俗观念之别^③。

韦伯学者也承认,《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全部论证是建立在神学家、作家的议论上面的,没有引用过一个企业家的实例。换句话说,这部书仅仅提供了“新教伦理”方面的证据,没有举出资本家怎样运用“新教伦理”的证据^④。余英时说,这种研究方式从历史社会学的观点看也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从严格的史学家观点而言,则究嫌美中不足^⑤。历史学家要避免理论先行地对历史

①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8页。

② 同上书,第143页。

③ 同上书,第276页。

④ 同上书,第73页。

⑤ 同上。

经验做出过分主观的解释,而是要从经验事实出发,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做出一种客观的阐释。史学家要想建立信仰与行为之间的关联,除依靠具体的经验证据之外,实别无他途可走^①。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可能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则不能成为史学^②。

余英时还指出了中国大陆和日本史学界对明清商人研究的不足之处。虽然他们搜集并整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对具体制度和事象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但他们的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商人的客观世界和经济活动方面,至于商人的主观世界,包括商人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在他们的研究取向上是不占重要地位的^③。余英时所著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则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主要研究儒家伦理和教养对商人的商业活动的影响。

笔者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余英时著作概括了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和社会变迁,以及三教对明清商业发展的推动作用^④,偏重中国近世宗教伦理的阐述,仅使用少量的商人资料,这无疑会削弱该著作的说服力。诚如他自己所说:“这次重印曾作了修正和补充。在补充的部分,最重要的是新资料的发现。其中最值得指出的是,一九八五年八月出版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这是一本内容极其丰富的材料书,其中所收集的资料,有不少是海外所看不到的孤本或稿本。但是可惜我一直到最近才有机会读到这部书,因此没有能够充分加以利用。大体上说,这部材料书全面地证实了本书的基本论点,使我对自己的看法更具信心。”^⑤

其实,徽商资料远远超过《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所涵盖的内容。从明代成化、弘治之际徽州商帮的形成到清代道光中叶徽商的衰

①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4页。

② 同上书,第75页。

③ 同上书,第59页。

④ 同上书,第57页。

⑤ 同上书,第78页。

落和解体的四百余年中,徽商执商界牛耳达三百年之久。徽商足迹“几遍宇内”乃至日本等国,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徽商资料主要分散在方志、文集、史著、宗谱、小说、杂著等文献资料里,也存在于各种文书、碑刻、信函、账簿中,还有耄耋老人的口碑传说里。尤其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徽州地区陆续发现的数十万件徽州文书,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更是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那么,按照余英时的研究思路,徽商的经验研究是否能够证明余英时的观点,从而可以对韦伯的“中国命题”进行检验?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余英时提出这个观点后,他本人并没有凭借徽商资料继续研究,徽学研究者也一直没有回应,不无遗憾。这项研究肯定是有价值的,恰好也是笔者的研究旨趣所在:儒家伦理如何建构徽商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性质如何,进而回应“韦伯式问题”。

二、研究现状

徽商在明清时期称雄商界数百年,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对如此重要商帮的研究,却起步较晚。系统地研究徽商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7年傅衣凌发表了《明代徽商考》^①一文,堪称研究徽商的奠基者。国外率先研究徽商的学者是日本的藤井宏教授,1953年他在《东洋学报》上发表了《新安商人研究》,深入全面地研究了新安商人的产生背景、活动范围、经营项目、资本形态等。20世纪60年代前期,叶显恩着手对徽州农村社会和佃仆制进行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徽商研究无人问津。直到改革开放后,徽商研究才有很大进展。1983年,叶显恩出版了《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与此同时,张海鹏教授组织学术团队开展徽商研究,先后出版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徽商研究》、《富甲一方的徽商》等专著,其中,《徽商研究》精

① 傅衣凌:《明代徽商考》,《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1947年第2期。

心挖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是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进入 21 世纪后,徽商研究日渐式微,少见优秀成果。

目前,徽商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王世华把它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①:首先,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出版了研究徽商的著作近 30 部,如《明清徽商资料选编》^②、《徽商史话》^③、《徽州朝奉》^④、《徽商研究》^⑤、《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⑥、《富甲一方的徽商》^⑦、《徽商与经营文化》^⑧、《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⑨、《左儒右贾——安徽帮》^⑩、《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⑪、《徽商与徽学》^⑫、《绩溪徽商》、《绩溪徽商》(续)^⑬、《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⑭、《徽商精神》^⑮等等。除了上述专著外,还有《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⑯、《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⑰、《中国十大商帮》^⑱、《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⑲、《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⑳、《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㉑、《两驿集》^㉒、《徽州宗族研究》^㉓等著作,也有相当的篇幅论

① 王世华:《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6 期。

② 张海鹏、王廷元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 年。

③ 朱世良等:《徽商史话》,合肥:黄山书社,1992 年。

④ 王磊:《徽州朝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⑤ 张海鹏、王廷元编:《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年。

⑥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1996 年。

⑦ 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年。

⑧ 周晓光、李琳琦:《徽商与经营文化》,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 年。

⑨ 陈智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札七百通考释》,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年。

⑩ 丁言模:《左儒右贾——安徽帮》,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年。

⑪ 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

⑫ 陈学文:《徽商与徽学》,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年。

⑬ 绩溪县志办公室:《绩溪徽商》,2001 年;邵之惠:《绩溪徽商》(续),2004 年。

⑭ 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 年。

⑮ 朱万曙、谢欣:《徽商精神》,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年。

⑯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年。

⑰ 安徽省博物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

⑱ 张海鹏等:《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93 年。

⑲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

⑳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㉑ 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 年。

㉒ 赵华富:《两驿集》,合肥:黄山书社,1999 年。

㉓ 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年。

述了徽商。论文更多,不再列举。其次,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研究徽商的人员已达二百人,日本、韩国、美国、荷兰也有学者研究。研究机构逐渐增多,主要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徽学研究会、黄山市徽州学研究会、杭州市徽州学研究会、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等,上述这些机构和学术团体虽以“徽学”、“徽州学”等冠名,但徽商无疑是他们的研究对象。最后,研究视野不断扩大。众多的论著深入探讨了徽商兴起、发展、衰落的历史;具体研究了徽商所从事的盐、典、茶、木、粮食、绸布等行业;不仅研究了徽商的主要活动范围,还涉及海外;不仅研究了徽商的整体特色、性质,还具体剖析了一些典型徽商个体;不仅研究了商业本身的诸多内容,而且研究了徽商的经营理念、商业道德、商业文化和心理特征等等。与本书有关的徽商研究文献,笔者概述如下。

徽商与徽州文化教育。张海鹏、唐力行认为徽州商帮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①。张明富认为“贾而好儒”并不是徽商的专有特色,同时期的江浙、山西、广东、陕西、江西等地的商人,也“贾而好儒”^②。王世华不赞同张明富的观点,认为就整个商帮的基本倾向、基本特征而言,“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而江浙、山西、广东等商帮只能找到少数“贾而好儒”的例子,不能作为整体性评价。此外,徽商的“贾而好儒”特色也得到了同时代谢肇淅、汪道昆、戴震等人的认可^③。张海鹏认为徽商是酿造徽州文化的“酵母”。徽商为新安理学的发展、新安医学著作的付梓、徽州教育的兴盛、徽派建筑的形成、新安画派的兴盛都做

① 张海鹏、唐力行:《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② 张明富:《“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③ 王世华:《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兼与张明富先生商榷》,《安徽史学》2004年第1期。

出了巨大贡献^①。张民服认为,徽商不是一个单纯以经商营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业性集团,而是从事与文化相关的活动。如:经营文房四宝和刻书业;捐资助学、兴建书院;教子业儒,参加科举;贾而好儒,亦贾亦儒^②。秦效成认为,徽商及其子孙后代是徽州文化建设中一支十分庞大而卓异的队伍;各地徽商的豪华宅第、书楼画室、园林别墅是本籍和外籍学者文士进行学术交流的最佳媒介;遍布全国的徽商网点及他们创建的义学、书院、会馆,又为徽人从师进修、观览风物、考察山川提供了方便^③。黄成林认为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徽州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徽商在经商活动中完善和传播着徽州文化^④。王世华论述了徽商与长江文化的关系^⑤。王成则论述了徽商对扬州文化的贡献^⑥。周晓光具体分析了徽商建筑文化的特色^⑦。桑良志又阐述了徽商与藏书文化的关系^⑧。“贾而好儒”的徽商对教育非常重视。李琳琦指出,高度重视儒学教育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凭借财力优势,殚思极虑,采取延名师课子侄、广设义塾义学、资助府学县学、大力倡建书院、收藏刊刻儒家典籍等方式,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儒学教育。徽商对儒学教育情有独钟有社会、历史和心理的多方面原因:一是受中国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二是中国封建社会价值观念的作用;三是与徽州社会深厚的儒学渊源有关;四是出于强宗固族的需要。徽商“振兴文教”,收到了人才辈出之效,不仅产生了一大批进士、举人和官僚,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徽州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徽州文化”。此外,他还有专文论述了

① 张海鹏:《徽商——酿造徽州文化的“酵母”》,参见《徽学研究论文集》1994年。

② 张民服:《徽商与明清文化》,《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③ 秦效成:《徽商与徽州文化》,《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

④ 黄成林:《徽商与徽州文化》,《人文地理》1995年第4期。

⑤ 王世华:《徽商与长江文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⑥ 王成则:《明清时期徽商对扬州文化发展的贡献》,《安庆师院学报》1999年第5期。

⑦ 周晓光:《明清徽商建筑文化的特色》,《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1期。

⑧ 桑良志:《十大商帮与藏书文化》,《黄山高专学报》2001年第1期。